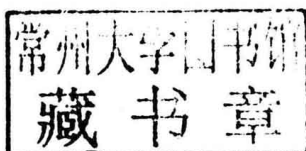


陈奇文集



陈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奇文集 / 陈奇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126-5497-6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9537 号

责任编辑: 郭 强

封面设计: 品诚文化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70

插 页: 4

字 数: 153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26-5497-6

定 价: 120.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昔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先作资料长编，凡540卷，历19载；又历13载，始成定本30卷。著述态度之严谨，堪为后世楷模。拙著酝酿于80年代中期，搜集资料，作《研究论著目录》、《研究述评》、《年谱》、专题研究论文，至成书，起迄10有4载。掩卷之余，犹感资料搜集不足，若干问题探究乏力。经费匮乏，外出几成画饼，只好给本书留下诸多遗憾，期待来者赐教、补正。资料搜阅及书稿撰写、出版过程

江淮平原，河湖之乡，长江北岸，运河西畔，有一座美丽的城市——扬州。这里山灵水秀，^风物佳丽，园林胜景，触目皆是。一路花柳、十里波光的瘦西湖，峰峦巧迭、楼台如画的何园，鬼斧神工，如诗如画。离乡赤子，频频回首，迁客骚人，流连忘返。1884年，刘师培出生在这里一个世代研究《左传》的书香门第。

扬州古称邗城、广陵、江都。公元前5世纪，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伐齐，在长江北岸构筑邗

明清之际多气节之士。史可法兵败被俘，从容就戮；刘宗周不食清粟，绝食而亡；孙承泽、李颢、黄宗羲拒绝清廷的征召，直至以死相抗，隐居终身。在王朝鼎革、天崩地裂之际，无数官僚士绅、文人学士，或慷慨悲歌，从容就义；或隐居山林，死不屈清，演出中国历史上至为悲壮的一幕。究其原因，不能不与理学特别是心学的广泛流传关系极大。正由于心学家至为重视修身立命、至为重视个人道德的完善，许多人才能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挺身而出，慷慨赴义。他们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危难关头舍身赴义，生死关头视死如归，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实践自身至善人格的追求。他们的高尚气节和人格，为后人世代传颂、效法，成为中华民族反对强暴的宝贵

自 介

陈奇，贵州赫章人。历史学硕士、教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马来西亚国际儒学大会学术顾问；原贵州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点领衔导师、贵州省省级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首席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教学与科研。主持、参与、策划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贵州古代儒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陆王心学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主持省级基金课题“刘师培研究”、“吴雁南文集编纂”、“吴雁南研究”。独著、主编《刘师培思想研究》、《刘师培年谱长编》、《经学与中国社会》、《中国经学史纲要》、《贵州古代儒文化与民族认同》、《中国近代史学习提纲》、《〈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篇目汇录》、《吴雁南评传》、《吴雁南文集》、《吴雁南纪念文集》等 10 种 15 册；副主编《清代经学史通论》、《心学与中国社会》，参编 10 余种；撰写《近代化：中国近代史的主流与红线》、《琦善弛禁问题复议》、《辛酉政变与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戊戌时期的政治共识与改革底线——张之洞旧体新用说略论》、《李端棻：政治资源与运作智慧：兼论官僚阶层的动向与戊戌变法的失败》、《理想与现实：贵州辛亥革命沉思录》、《刘师培的今古文观》、《湛若水心学探析》、《王阳明心学与人的主体精神的昂扬》、《黔中王学与孙应鳌心学》、《屯军与贵州明清儒文化：以安平陈氏家族为个案》、《清道咸学人郑珍对〈仪礼〉的研究》、《太平大同：理想社会的丰碑》、《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角色意识》、《忠恕之道促进世界和平》、《“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王阳明的物我和谐观》、《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与现代意义》等论文 120 多篇，其中近 40 篇为权威期刊、重要期刊、核心期刊以及吉隆坡、雅加达、中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著述总字数 700 万。

我的学术生涯与感悟（代序）

2015年7月，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贵州古代儒文化与民族认同》结题，最后一项职务科研结束，获得了自由之身，遂开始将平生文章汇集成册。整理工作历时近两年，计录入文章254文、约144万字；分为3编：儒学研究、史学研究、随笔。第一、二编大致可以谓之论文，计129文、约110万字；第三编为序、记、演讲稿、心得体会一类随笔，计125文、约34万字。整理汇集的原则：其一，录入文章，既包括已发表过的。也包括少量未发表过的。其二，手稿、初稿尚存者，依据手稿、初稿整理。其三，文章内容、结构一如原貌，仅做技术性校改，主要是文字的衍、脱、讹、误等。其四，对于论文所引用的大量文字，均依据论文写作时所用文献版本，一一核改。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1981年的本科毕业论文《原始社会食人之风探析》，1.8万字。原始社会存在过食人风气，食人的根本原因在于食物的缺乏，这个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早就有过论断。但是，在简单化了的阶级斗争主线论年代，学术界盲目地颂扬原始共产主义，忌讳提及原始社会存在过食人风气；即使提及，也否认食人的根本原因在于食物的缺乏，认为那是出于某种宗教信仰的缘故。我以大量古文献、考古发掘和仍然生活在当代的原始民族的社会调查资料，对恩格斯的论断进行了论证；进而指出，至旧石器晚期，食人风气才赋予了宗教色彩；虚幻的宗教追求采取了食人肉的物质形式，反过来证明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期一定还存在过一个由于食物缺乏的原因而以人为食的时期。文章后来发表在《贵州师大学报》2004年第5期；此前，《贵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发表了该文《摘要》。1996年，我曾冒昧地将文章寄到《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回信肯定了文章的学术价值，建议进一步从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的角度深化理论分析。虽未录用，我却备受鼓舞，须知《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层次的学术期刊，迄今为止似乎尚无贵州学者在上面发表过文章。

1983年，我考取贵阳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吴雁南先生。一年级下学期，先生为我开设了一门课程《清代经学史略》；一年级结束，按规定撰写了学

年论文《贵州汉学家郑珍》；毕业论文亦以经学为范围，题为《辛亥革命时期刘师培的经学》。毕业后30来年间，发表了《郑珍与汉学》、《郑珍经学门径刍议》、《刘师培的汉宋学观》、《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与现代意义》、《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角色意识》、《太平大同：理想社会的丰碑》、《王守仁的致良知与事上磨炼》、《“我与天地万物一体”：孙应鳌的“天人合一”思想》、《屯军与贵州明清儒文化：以安平陈氏家族为个案》等80余篇论文，出版了《中国经学史纲要》、《经学与中国社会》，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贵州古代儒文化与民族认同》，而《刘师培思想研究》、《刘师培年谱长编》两部著作中也有大量有关经学的内容。学业初始的一门课程和两篇论文，影响了我的一生，经学或者说儒学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著作和论文阐述儒学兴衰演变的历史，探讨儒学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着力发掘儒学的现代意义。

第一，郑珍研究。关于郑珍的学术门径，或以为“不立门户”，“汇汉宋为一藪”；或以为以字通经，走考据道路，实为“朴学”亦即汉学。1984年撰写的、10万字的研究生一年级学年论文《贵州汉学家郑珍》，从郑珍的师承关系、治经宗旨、治经内容和治经方法等诸多方面论证：总的说来，郑珍还是一个汉学家；但他生在当汉学走向衰落的道咸时期，主张吸收理学义理之学以克服汉学专事考据的弊端，多少具有了一些反映着时代气息的特点。后来，我在此基础上发表了10余篇关于郑珍经学研究的论文，而最初的两篇，《郑珍与汉学》发表在《贵阳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郑珍对说文逸字的补正》发表在《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两篇文章都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刊物《语言文字学》全文转载了，前者转载于1985年第8期，后者转载于1986年第1期。我是“文革”以后最早对郑珍经学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人，可惜那时科研意识不强，没有及时就这个课题继续研究，写成专著出版。记得1985年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我提交论文《郑珍〈仪礼私笺〉评介》，论文集的编辑在师院研究生宿舍找到我时，颇为感慨地说：“还以为作者是位老先生，没想到是位年轻人。我们都看不懂，清样还得请你自己看。”

第二，儒学史。儒学形成于春秋末期，西汉中叶独尊为经学，成为古代社会的主流学术、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演绎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理学、汉学几个主要学术流派。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东汉以后衰落；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隋唐，宋代为理学所取代；理学兴起于北宋，清初虽然衰落，但依然是官方“正学”；汉学兴起于清初，乾嘉时期达于鼎盛，鸦片战争以后衰落。两千多年中，无数文人学士，皓首穷经，顺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的变迁，发掘、引申、丰富着儒学精蕴，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进程，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智库，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三，儒学与社会。其一，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仁者“爱人”，以仁爱之心待亲人，孝敬父母，敬兄爱弟；进而将仁爱之心扩展到社会层面，实现人与人之

间的相亲相爱。如此，社会的安宁、和谐就有望实现。工业革命、商品经济伴生出某种程度的信仰迷茫、精神失落乃至道德的沦丧，儒家的仁爱思想“可以为工业社会提供宝贵的补正”。其二，礼是儒家学说的又一核心内容。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社会角色意识，一种关于社会角色区分和角色规范的思想。这种思想固然包含着专制时代不平等的、严格的等级划分和不对称的权利义务规定，但是，作为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代名词的礼，作为社会应该有角色区分和社会角色应该循行权利义务规范的礼治思想，却是任何时代、任何类型的社会都不可或缺的，它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维系社会文明有序起着巨大的作用。”其三，儒家天神崇拜本质上是对自然力的崇拜、敬畏。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念、王阳明的“天地万物与人原为一体”命题、孙应鳌“我与天地万物一体”论题，强调物我即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必要性及内在可能性，这对于面临巨大生态危机的当代人类来说，无疑可以起到提升信念的作用。其四，《龙场悟道与王守仁心学》、《王守仁的心即理及其认识论意义》、《王守仁的致良知与事上磨炼》、《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与体究践履》、《“人皆可以为尧舜”：道德的内化》、《李贽的童心与心学》、《论王良的身本心学》、《心学与清初思想解放潮流》等20多篇论文，突破传统心学研究中简单否定的思维定式，系统论述王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社会影响，着力发掘王学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道德修养、强调知行合一等积极因素。其五，80余万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贵州古代儒文化与民族认同》，尝试架构大文化意义上的儒文化理论体系；以为包括理论儒学、制度儒学、文化儒学及物化儒学在内的儒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先进文化，它为古代民族认同提供了理论体系及意识形态、儒学教化内容及路径、制度保障、物化基础。古代贵州，伴随着大一统王朝治理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汉族为主体的移民的不断进入，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至于明、清前期，儒文化传入、缓慢发展、飞跃发展、兴盛；不仅在汉族中广泛流播，而且在少数民族中也较为广泛地流播，最终成为社会文化主流，推动着各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初步形成，推动着民族认同初步实现、大一统王朝认同基本实现。儒文化是贵州古代民族认同的主体文化元素。由国家社科规划办组织的同行专家鉴定意见认为，该课题“对儒文化本身作了重新的解构和探索”，“理论上有所建树”。成果“在系统深入地阐述儒文化在贵州传播发展的基础上，论述了贵州四个族系的少数民族在王朝治理、汉族影响下的以儒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注意到了少数民族在推进民族认同中的独特作用，形成了目前学术界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为探讨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认知基础。”成果“是目前最为系统的揭示儒文化与民族认同关系的成果”；“在理论创新和重开学术思路上都是一本上好著作”；“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突出的现实借鉴意义”；“在正式出版发行之后，其中的不少观点将会受到关注，有的观点将会引起争鸣”。

我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课程教学，中国近

现代史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具体的领域，在近代化问题研究、鸦片战争史研究、刘师培研究、吴雁南研究等方面。

第一，近代化问题研究。专著《中国近代史学习提纲》，《求实创新，开拓近代史研究新气象》、《近代化：中国近代史的主流与红线》、《师夷长技，向西方学习：近代中国最响亮的时代口号》、《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从毛泽东同志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述说起》、《辛酉政变与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戊戌时期的政治共识与改革底线：张之洞旧体新用说略论》、《李端棻：政治资源与运作智慧：兼论官僚阶层的动向与戊戌变法的失败》、《理想与现实：贵州辛亥革命沉思录》、《曲折中艰难前行：辛亥后社会长期动乱的困惑与思考》、《无政府主义与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等论文，以及上述鸦片战争史研究、刘师培研究论著，突破传统近代史研究中简单化的、公式化的、绝对化的阶级斗争范式，以为中国近代史是近代化亦即“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的历史；中国近代的历史“除了屈辱、悲壮、沉沦的一面，还有发展的、进步的、上升的一面，也就是近代化的一面”；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流与红线”。以近代化范式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从马戛尔尼使团到晚清新政，从李鸿章到慈禧太后，都可以得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其一，“从根本上说来，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商品生产，为出售目的而生产出来的商品，决定了它必须占有市场，必须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一切有人群的角落。”“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显得极端的疯狂、野蛮、残酷，杀人、放火、战争、掠夺，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充满了血与火，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肮脏的血。但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是人类进步的潮流，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是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必然路向，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和地区、每个民族、组织或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不管这种潮流的冲洗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是和平还是血腥，都不可抑遏。世界上每个地区、每个民族，或迟或早，愿不愿意，都要被卷入这个潮流中去。”落后国家或地区要么顺应时势，主动融入世界大潮，趋利避害；要么被动挨打，被动融入。其二，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时间场合对洋人、教民一概逐杀的做法，那种对外来事物乃至与“洋”有涉的事物一概抵制、焚烧毁损的做法，虽然包含有对西方列强的愤激、抗议成分，却于事无补，不能真正达到爱国救国的目的。“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睛都发蓝……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如此反洋教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助长迷信，助长盲目排外，把中国拉回到闭关自守的旧轨道。这最终无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无助于实现反帝救亡、振兴中国的民族大业。其三，18世纪末马戛尔尼使团要求派驻公使、扩大通商，或符合近代国际外交惯例，或有利于中国融入近代世界经济大潮；提出仿澳门先例“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土地”，固然有损害中国领土主权之嫌，但似与领土割让有别，因为18世纪末的澳门，主权尚属于中国；在同意其合理要求的同时，是可以通过谈判予以抵制的。

其四，西方国家的修约要求，核心是派驻公使、扩大通商。如果清廷同意了这两条，按照西方国家的谈判底线，是可以使其放弃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一非法要求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也可能因此而推迟甚至避免。只可惜清廷的既定方针，不仅不会接受派驻公使、扩大通商要求，而且根本不与之谈判，不与之直接接触。其五，《北京条约》是奕訢为首的务实派在“取得英、法联军撤军、基本承认中国领土完整的条件下，忍痛妥协，全盘接受英、法苛刻条件”情况下签订的屈辱条约，它为中国赢得了20来年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北京政变“固然是统治中枢的权力之争，但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围绕着治国方略的分歧和争论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面对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载垣为首的强硬派集团坚决主战，以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奕訢为首的务实派集团则力主议和，争取时间，变革自强。“两大集团矛盾的激化加速了宫廷政变的发生。政变以后，强硬派集团崩溃，务实派集团得势，在20来年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开始了中国外交、军事、经济、政治近代化的艰难历程。”北京政变是“中国近代化发端转折点”。其六，马嘉理所率领的是一支探险队，其所携带的武器系防身所用；进入云南境内是得到总理衙门同意的，不属“非法”。清朝地方政府层层防堵，暗中鼓动民间与之对抗、冲突并杀死了马嘉理。《中英烟台条约》中，关于道歉、抚恤的条款并不为过；扩大通商、增开商埠对于中国融入世界潮流利大于弊。其七，青岩教案的直接起因在于百姓率先辱骂教民，冲突发生后地方民团径行杀死教民及教堂佃户、帮工；深层次原因在于贵州巡抚、提督等官员盲目排外，暗中指令地方官绅“藉故”制裁教会。开州教案直接起因在于教民拒绝交纳民间元宵耍龙灯钱款，冲突发生后开州官府径行捉拿、处死教士、教民。其八，天津教案中，所谓育婴堂拐卖儿童的传言系误传，所谓将婴儿剖腹挖心是对医学解剖的不解。传言发生后，整个天津地区杀洋人、烧洋房；而法国领事的蛮横行径进一步扩大了冲突。其九，中法战争中，镇南关大捷并未根本扭转中方不利局面，形势依然严峻。李鸿章审时度势，签订《中法会定越南条约》。该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没有赔款、没有割让本土的条约。其十，《马关条约》是李鸿章在中方无力再战的情况下迫不得已的无奈妥协；谈判中竭尽心力，取得了减少赔款数额、减少土地割让面积的结果。其十一，戊戌变法是在清朝现存体制下进行的和平的政治变革运动，是必须最终由现存实际政治领导人慈禧太后认可、中立默许甚至是容忍始可付诸实践的运动；如果得不到认可、默许乃至容忍，变法就不能发动，发动了也只能中止，只能退却，只能等待新的时机。现存政治秩序下进行的和平改革就是如此无情、残酷；如果不中止、不退却，那么就只能铤而走险，与反对改革的势力决裂，公开对抗。戊戌变法运动就是沿着后一条道路走向失败的。变革精英要使变法成功，必须讲求高度娴熟的变法策略，具备高度的政治运作智慧。运动之初，改革先驱以及现存政府官员中同情、支持、认可变革的力量总是处于弱小的地位，反对变革的力量总是处于强大的地位。变革精英必须采取缓步推进的策略，不断扩大改革派的力量，努力争取洋务派、开明派官员的同情、支持，避免将他们推到保守派一边；最

大限度地减少保守派官员的反对，争取他们对改革的认同、中立默许甚至是容忍，避免与保守派的矛盾激化，避免矛盾冲突的公开化、炽热化。维新精英们以及光绪帝过于激进的变法策略，疏远了同情及一定程度支持变法的开明官员，激化了与慈禧太后及守旧官僚阶层的矛盾，终至失败。其十二，戊戌时期，张之洞刊行《劝学篇》，主张中体西用。由翁同龢草拟、光绪帝颁行的明定国是诏，所定变法大纲就是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其时，无论是知识阶层中的开明部分还是官僚阶层中的开明部分，乃至下旨变法的光绪帝本人，都还没有做好实行开国会、定宪法的准备，还没有达成实行君主立宪改革的政治共识。政治改革的共识是中体西用，政治改革的底线是中体西用，张之洞《劝学篇》所提出的旧体新用说就是当时这种政治共识、政治改革底线最准确、最完整的表述。强调这样一种水平的政治共识及改革底线，并不影响对于戊戌变法运动所具有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运动性质的认定。首先，作为改革运动中坚、倡导、推动者的维新精英，在运动中是明明白白地提出了开国会、定宪法、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其次，戊戌变法运动是一个动态的运动。君主立宪的目标虽然在百日维新中没有被采纳，但是，20世纪初年，维新派继续为之奋斗。1906年，清廷终于下诏预备仿行宪政，宪政改革的主张终于付诸实践。其十三，《辛丑条约》的签订，是在中国濒临灭亡的时刻、在尚能基本保持领土主权完整的条件下迫不得已的妥协。条约签订前后，慈禧太后即下诏实行新政，编练新军、废科举、振兴工商。所谓慈禧太后投降卖国、清廷沦为洋人朝廷的评价，是一种情绪化的评论，不尽合于历史的真实。其十四，晚清新政固然是革命党人、立宪派多方压迫的结果，但它毕竟是由清政府自己进行的，清政府在被动之中有主动，不情愿之中有情愿，消极之中有积极，其改革幅度之大、步伐之快，较之日本明治维新过之而无不及。其十五，整个中国近代，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论争始终没有停息。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顽固派依旧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以为“根本之固，在人心不在技艺”。90年代，学习西方的内容开始深化到政治层面。20世纪初年，向西方学习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围绕需不需要引进西方的资金、人才，又产生了“经济保守”文明排外的现象，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就是这种经济排外现象的反映，核心还是对“向西方学习”的认识，而此时距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其十六，袁世凯取代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于他拥有迫使清室退位的实力，在于孙中山的明智妥协，不应简单地斥之为“篡夺革命果实”。恢复帝制，实行的是君主立宪，不应简单地斥之为“复辟”甚至“封建复辟”。戊戌维新时期向荣禄密告康有为密谋兵变事，有人依据日本所存史料论证，并非密告在先、政变在后，因密告而发生政变，而是政变发生，始告密谋兵变事。如此说成立，则袁世凯“出卖”维新党人之说可以否定，关于袁世凯的评价会有根本改变。其十七，“清末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是立宪思潮而不是革命思潮……如果拥有相当统治网络和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慈禧太后不在1908年死去，如果清政府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不操之过急或者

能够采取较为灵活的变通政策，那么，川鄂湘粤4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就不会发展到那么大，湖北新军就不会入川，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要么可能不会爆发，爆发了也可能如同半年前的黄花岗起义那样旋起旋灭。到1913年，国会如期召开，中国可能从此缓慢地走上君主立宪、和平改革的道路”。辛亥以后，旧的权威倒下了，新的权威立不起来，中国陷入长期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的局面。“在客观物质力量的成长还未壮大到足以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的时候，激进的、理想主义的行动酿就的必然是一杯难以下咽的苦酒，而一种渐进的和平改革道路也许应当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当然，“这一切都只能是一种假设和推测，只能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思考和反思了。”

第二，鸦片战争史研究。1990年鸦片战争150周年，中央到地方都举办学术研讨会，不忘国耻，爱我中华。参加学术会，是发表文章的机会；不管平素是否有研究，都会尽量写文章参会，俗称“赶庙会”。对于鸦片战争，我没有专门的研究，相关的知识仅限于本科、研究生读书时期的水平。提到鸦片战争，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林则徐。查阅文献，有关林则徐研究的成果很多，难有突破。不过，无意中看到一本小册子——林则徐的《使滇日记 使滇杂记》，即以之为资料，写了一篇小文章《林则徐过贵州》。其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即检索该书，打算以《鸦片战争时期的贵州》为题写一篇论文。检索结果颇为失望，有关贵州的史料甚少，只写成一篇千余字的小文章《厉行禁烟，出兵援粤：鸦片战争时期的贵州》。预设的未写成，检索过程中却意外地发现，相关史料证明，关于战争前夕的禁烟讨论和禁烟运动，与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权威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陈旭麓《中国近代史》、龚书铎《中国近代史纲》，无一例外都提出，禁烟讨论和禁烟运动中均存在严禁和弛禁两个派别，弛禁派的首领为穆彰阿、琦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一口气写出了《再评鸦片战争前夕的禁烟讨论和禁烟运动》、《琦善“弛禁”问题复议》、《晚清整饬吏治与禁烟运动》数篇文章，论定：鸦片战争前夕的禁烟讨论和禁烟运动中并不存在严禁和弛禁两个派别，存在的仅是有关禁烟方略的争论；通过讨论，道光君臣在厉行禁烟问题上达成共识，上下一心，内外协力，禁烟和整饬吏治均取得了重大成果。琦善同样主张严厉禁烟，特别强调禁烟的关键在于整肃吏治，主张从重处罚官员中的违禁、失察行为；他所主持的直隶禁烟运动，成果仅次于广东。《再评鸦片战争前夕的禁烟讨论和禁烟运动》提交贵州省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入选会议论文集。看清样的时候，编辑说，选入的23篇文章，真正称得上学术论文的，“只有你这篇”。《琦善“弛禁”问题复议》发表于《史学月刊》1998年第2期，并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刊物《中国近代史》全文转载；多种著作收入该文章摘要，介绍文章观点，评价文章“选题好，立意新，观点明确，论述严谨，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

第三，刘师培研究。我的学术生涯中，着力最多、耗时最长的为刘师培研究。关于刘师培其人，1949年以后的大陆学术界，简单地论定为叛徒、内奸、帝制祸首，列为负面人物。70年代末80年代初，情况开始有所转变。我的刘师培研究，始于80年代中期的硕士学位论文《辛亥革命时期刘师培的经学》，初稿约10万字，定稿4万多字；1999年出版31万字的《刘师培思想研究》；2007年出版50万字的《刘师培年谱长编》；其间，发表了近20篇论文。上百万文字，对刘师培一生事迹、政治功过及学术成就作了全面、深入的剖析，突破传统的对刘师培基本否定的评论，在指出其思想复杂多变、后期堕落为叛徒、内奸、帝制祸首问题的同时，如实肯定其国学大师的学术地位以及投身革命时期系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的政治地位。发表文字中，《刘师培的今古文观》、《刘师培的汉宋学观》、《讲习会派社会主义思想探析》载于《近代史研究》；《刘师培的经学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宣传》、《信仰支撑的崩塌：刘师培堕落原因再探》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刊物《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代史》全文转载；《刘师培思想研究》为学术界论为“刘师培思想研究的第一部通史性著作”，“为研究清末民初社会思潮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师培年谱长编》“资料翔实”，“持论公允”，“体例规范”，“治学严谨”，“是对中国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的一大贡献”，一度位列国家图书馆中文类图书借阅量排行前20名，列入“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候评书目；《刘师培的今古文观》、《刘师培思想研究》分别获省级社会科学成果奖。经过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学者的努力，刘师培研究呈现高潮，刘师培的地位得到了如实评价。1997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刘师培全集》，反映了主流媒体对于刘师培研究成果的认可。

第四，吴雁南研究。2001年8月，导师吴雁南先生逝世。2003年，我与朱健华教授主编出版了230万字的《吴雁南文集》、《吴雁南纪念文集》；2010年，我主编出版了40万字的《吴雁南评传》。先生是中国当代知名的教育家，在人才培养特别是研究生培养、教材编写、教育科学研究及高等教育管理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儒学与传统文化诸多领域内取得了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重大的突破性成果。厚重的理论素养，渊博的学识，对史料的充分占有，秉笔直书的学术勇气，强烈的创新意识与开拓精神，杰出的组织策划能力，厚道包容的人格魅力，是他所以能在诸多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所在。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贵州少见，在全国也不多见。他的学术成就及治学经验，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文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贵州学术界在全国学术界乃至国际史学界的一张名片。《评传》是关于吴雁南先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就吴雁南先生的教育成就与思想、学术成就与治学经验做了全面、系统、深入的介绍、总结、探究，就其学术成就的地位、价值与意义做出了深刻、公允的剖析、评价、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进步，得益于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得益于研究范式的转变。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并无过错，过错在于将

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刘师培后期堕落为叛徒、内奸、帝制祸首，就只能划入反动人物阵营；既然属于反动人物，就只能揭露、批判，叛徒、内奸、帝制祸首之外，其国粹研究是复古倒退，其革命活动是投机；即使提及其积极部分，也只能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否则就有为反动人物歌功颂德之嫌；即使采取了揭露、批判的态度，也只能少研究甚至不研究，否则就是漠视正面人物，漠视人民大众，就是阶级感情问题、阶级立场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旧的上层建筑阻碍了新经济基础的建立时，就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旧的上层建筑。阶级斗争理论并无过错，它与历史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但需注意，其一，必须将阶级斗争理论放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更大的、根本的范畴内来运用。阶级斗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阶级斗争的目的是变革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经济基础的建立；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其二，阶级斗争不仅指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暴力，而且包括和平的、缓进的变革运动；就社会存在的长河而言，其发展进步更多地在于和平的、缓进的变革运动。其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不是非此即彼、非红即黑的简单的两分法，必须将其放到具体历史环境中作具体的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我出生在黔西北贫瘠山村，出门是山，行走是坎，峰峦叠嶂，道路崎岖。山乡的艰苦环境，铸就了我的坚毅与执着，苦难的乡村生活，造就了我的上进与勤奋，从读书至今日，难有假日，难有闲暇，至今不识么鸡为何物，复牌为何意。勤而聪颖，可为上人；愚而勤奋，犹为中人；愚而惰怠，则下人舍其何哉。我的一生，勤奋有余而忆性欠佳，坚毅有余而悟性不高。勤能补拙，毅能补钝，昔日乡村娃，做梦也想不到能在大学讲坛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学坛有一语之权，知足矣！常乐矣！